

反革命两派张国焘

于吉楠

三、投佞王明，破坏鄂豫皖根据地

“钦差大臣”夺权

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回到上海，开始了新的反革命投机活动。

当时，我们党正面临着—场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斗争。半个月以前，王明反党集团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从各方压迫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是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上台的，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胡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把矛头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王明以我为核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夺权，对不同意见他错误路线的人，任意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卖农路线”、“反党、反共产国际”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好端端的中国革命，被他搞得乌云升空，浊浪翻滚。

王明反党宗派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倒行逆施，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老奸巨滑的张国焘，心里却另有一番盘算。他见王明后台硬、权势大，是实现其个人野心必不可少的阶梯，于是，加紧勾结，狼狈为奸。从二月初到三月初，张国焘在党内刊物《实话》上，连续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等黑文，公开亮相，为王明抬轿子、吹喇叭。他极力美化四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后的过程，是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重要关键”，“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拼命鼓吹“坚决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向王明表示效忠。他还无耻地吹捧说：“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要同所谓“借反对陈绍禹派为

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的人斗争到底，杀气腾腾地为王明路线保镖。王明对张国焘十分欣赏，便封他为“钦差大臣”和自己的亲信陈昌浩一起派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夺权。

四月十一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率到鄂豫皖根据地黄安县松树岗以北之打虎山。第二天，在新集与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同志会面。曾中生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和面临的艰巨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一九二七年黄麻秋收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发火起来的。一九二八年，黄麻起义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在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学习井冈山的办法，在鄂豫边界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同志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同志任党代表，王秀松同志任鄂东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吴光浩同志牺牲后，党中央派徐向前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党在河南商城南坪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同志任师长，徐其虚同志任党代表；同年冬，党又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工农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三师，徐百川同志任师长，姜饼坐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相继开辟了鄂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鄂豫边党政领导机构，徐朋人同志任鄂豫边特委书记，曹学楷同志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成立，郭述申同志任书记，红军统一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同志任军长。红一军成立后，乘蒋、冯、阎混战之机，大举出击，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光山、罗山等县城，歼灭大鬃敌人，全军发展到五千多人。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曾经命令鄂豫皖的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并在根据地内实行许多“左”的政策。但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派坚决抵制立三路线的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同志，来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很快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由于当时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力军的运动战和群众性歼击战相结合，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等项作战指导原则，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蔡申熙、陈奇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同志任军长，余笃山同志任政委。四月至五月，红四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歼敌六千多人，胜利粉碎了第二次“围剿”。这时，红四军已发展到二万多人，地方武装扩大到一万多人，根据地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大别山区一片火红。

但是，张国焘阴谋夺权，根本不想了解什么情况。他贼眼一翻，凶相毕露，指手画脚地大骂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胡说“党、苏维埃和红军隐藏着许多危机”，必须按照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五月十一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另行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自任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团中央分局书记，篡夺了领导大权。

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又召开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进一步贯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会议，在“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之下，全盘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当即遭到曾中生等许多

同志的严正驳斥。这个阴险狡猾的家伙，恼羞成怒，利用职权，给曾中生同志扣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党内和平的倾向”的大帽子，强迫承认“错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同志，因发表文章抵制张国焘“左”倾的劳动政策，也被诬为“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批判”和罢职。徐朋人同志曾经代表鄂予皖特委出席四中全会，参加过反对王明反党宗派集团的斗争，回来后又坚决抵制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张国焘更是恨之入骨，强加以“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的罪名，在会上宣布开除党籍，妄图用这种卑劣手段，恐吓广大党员和干部，强行贯彻王明路线。

张国焘象瘟神一样，给鄂予皖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转变”与“改造”的严重罪恶

张国焘篡夺领导大权以后，疯狂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实行“转变”与“改造”，遭到鄂予皖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这场激烈的斗争，首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对鄂予皖根据地暂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的好时机。因此，在鄂予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领导同志就曾提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皖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但是，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上，借口“巩固苏区”，污蔑这个正确提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加以否定。会上，经过激烈争论，由于多数同志一再坚持和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任务所迫，他才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七月初，军委在西余集开会讨论兵力使用和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又一变而为“左”倾冒险主义，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存下英山，出汴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坚持正确主张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但张国焘不顾大家的反对，仍按其错误意见作了决定。

七月中旬，在军长徐向前同志和政委曾中生同志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力南下，于八月一日攻克英山，全歼陈调元部张汉全团，缴枪三千多支。占领英山县城以后，红四军领导同志对汴山、太湖、安庆地区和圻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比较，认为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领导同志一百把意见报告鄂予皖中央分局，一百举兵南下。八月中旬，红四军连克罗田、浠水、广济，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九月一日，洗马畈一战又歼敌一千多人。仅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七个团，缴枪四千多支，俘敌五千余人，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形势十分有利。

正当红四军沿着正确方向，大力开辟英、广、黄地区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急忙给红四军领导同志写信，无理指责改变攻打安庆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立即北返。红四军领导同志

被迫放弃大异歼敌的有利时机，带领红军返回根据地，同时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及其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进行了抵制。九月五日，红四军军部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支干书记、指导员以上干干会议。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以来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赴英山、圻春、黄梅、广济地区工作，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斗争。而目前敌对鄂豫皖老根据地的“围剿”尚未到来，且给养困难，故不宜北返。军部将会议讨论意见，再次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并且写信把分歧问题报告了党中央军委，明确地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方针。报告中说：“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的工农政权维系着，则如此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豪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忘却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主力束缩在根据地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方针，他手中没有真理，不敢明辨是非，竟使用官僚政客手段来对付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他处心积虑地要“改造”红四军的领导，早在五月间就扼换了卞继勋、余笃山同志的工作，这次更阴谋乘机篡夺军权。九月十三日，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中，不顾广大指战员的激烈反对，立即宣布撤销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借口“肃反”，排斥异己，随便抓人。十月，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大肃反”，捏造红四军中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组织”和“全盘反革命计划”，污蔑红四军南下的作战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蛊惑”，符合“反革命”的企图，并以此为借口实行罪恶的宗派主义打击政策。许继慎、周维炯、姜饼生、熊受喧、魏孟贤等数百名红四军优秀指挥员，都被张国焘诬为“反革命”加以杀害，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接着，张国焘在浠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干会议，对曾中生同志进行“斗争”。他作贼心虚，不敢涉及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争论的实质，歪曲真相，混淆是非，给曾中生同志加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宣布调离部队进行“考查”。从此以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便在鄂豫皖的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借口“肃反”，排斥异己，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是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阴谋篡权的重要罪恶手段。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干和战士，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坚强革命者。他们坚持正确路线，抵制错误路线，对敌斗争不畏艰险，为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张国焘篡夺领导权，推行王明路线的严重障碍。当时，对混进根据地内进行破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肃反是必要的。但是，张国焘却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颠倒敌我关系，把矛头指向这些创造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干干，胡说什么“红军中党团组织大半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包办”，“红军党的下层组织与领导完全在改组派手中”；恶毒污蔑黄麻等县委常委内“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在这种假左真右的反动舆论的煽动下，张国焘在红四军开始“肃反”以后，有计划地发展地方武装、党团组织、政权机关和工会等群众团体，造成严重的

肃反扩大化。肃反又采用逼供方式，制造许多假案，成批的干卫与群众被关进保卫局。张国焘还使用特务手段，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为他侦查各级领导干卫的言行。许多干卫、战士，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知识分子普遍戴上“异己分子”的帽子，被清洗掉。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王秀松、徐百川、陈定候、陈奇、徐仁先等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都被他偷偷摸摸地暗害了。张国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国民党的勾当，起了蒋介石起不到的作用，犯下了滔天罪行。周维炯同志被张国焘诬陷为“改组派”，遭到迫害时，大义凛然地怒斥道：“我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不屈。实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黄安广大干卫和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对张国焘的阴谋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张国焘阴谋破坏的黑手还伸向土地革命方面。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初就开始了土地革命。一九三〇年以后，在广大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土地已经全卫分配了。虽然曾经一度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发生了“左”的偏向，但很快就克服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党的领导下，几百万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横扫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红色政权，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与红色政权发卫与巩固的最坚定、最深厚的基础。这些胜利成果，张国焘都一概加以否定，攻击鄂豫皖根据地“因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路线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利益大卫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他竭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尤其强调反对富农，规定了“左”倾的划分阶级的政策，作出“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结果，搞乱了阶级阵线，侵犯了中农利益，甚至连贫农也反了，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在经济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也都按照王明“左”倾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打击中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实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张国焘犯下这些严重罪行之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信向王明反党宗派集团报告，颠倒黑白地说：“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王明反党宗派集团复信嘉奖，称赞张国焘“执行了正确的党的路线”，“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歪曲不了的。这伙叛徒所谓的“转变”和“改造”，正是断送鄂豫皖根据地的罪恶根沅。

从“偏师”说到仓皇西逃

张国焘的阴谋破坏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扑灭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烈火。英宏的鄂豫皖军民，忠于党，忠于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我们党的正确路线，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三一年八月，毛泽东同志领导红一方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

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七日，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胜利诞生。在这一巨大胜利的鼓舞下，鄂予皖的红军扩编为红四方军，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红四方军成立后，随即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正确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充分运用了“围城打援”战术，指挥红军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军主力首战告捷，攻下黄安，全歼守敌五千余人。一九三二年一月，挥戈北上，在予南亚港地区又击溃敌五个团。二月，南围商城，击溃援敌二千多人，不战而收复商城。三月，红军兼程东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经过四十八天的浴血奋战，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共三万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敌人不甘心失败，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和上海爱国军民对日抗战之后，集结了二十四师另五个旅的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首先对鄂予皖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这时，红四方军主力部队已扩编为六个师，五万多人。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县的红色政权，使红军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军民斗志十分高涨。如果指导路线正确，粉碎敌人这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张国焘却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不承认毛主席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早在二月间就提出荒谬的“偏师”说。二月十七日，鄂予皖省委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贯彻王明“左”倾路线一月九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胡说什么：“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鄂予皖苏区党的严重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三月三十一日，张国焘和陈昌浩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而且要以“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五月，苏家埠战役胜利后，张国焘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他胡说，国民党只有七个主力师，中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鄂予皖搞掉它两个也不成问题，剩下三个师，“围剿”还称什么？六月间，陈昌浩在新集作报告，也叫吐“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势力占优势，我们去包围敌人，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因此，张国焘对新的更加严重的“围剿”的到来毫无准备，反而提出红军打武汉的错误战略方针，这就种下了第四次“围剿”不能粉碎的根苗。

七月间，鄂予皖分局召开会议，讨论军事问题。会上，徐向前同志认为红军已经连续七个月苦战，极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认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张国焘蛮横地加以拒绝，坚持“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指挥下，七月上旬，红四方百军主力开始围攻麻城。敌依城凭坚固守，红军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且使敌人从容部署“围剿”。一个月以后，敌军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过来，张国焘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才不得不掘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反而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命令十分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与敌人硬拚。八月中旬，红四方百军主力在七里坪与敌血战七天七夜，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反复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五千余人。七里坪战役后，张国焘又复头脑发热、忘乎所以，胡说“国民党动员任何多的军队，都不堪我军一击，国民党主力军已损失过半，以鄂予皖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地位。”其实，当百敌人退缩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并没有解决问题。以后，红军主力接连转战予南、皖西，亦因敌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都未得手。十月初，红四方百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于河口歼敌四千余人。红军苦战两个月，虽多次击溃敌人，但终因张国焘战略方针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这时，鄂予皖根据地已经损失了六分之五，除黄安、麻城、霍邱、英山四坐县城失陷外，中心市镇如新集、七里坪、金家寨、麻埠、独山、燕子河、化店、河口、张店等也全数沦陷。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左”倾轻敌，变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雄心。他认为，“鄂予皖地处平汉、津浦两路之中，滨大江之侧，为敌人必争之地。帝国主义要争，国民党要争，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立为根据”，偷偷地准备西逃了。

十月十四日，鄂予皖中央分局在河口北面的黄才畈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张国焘竭力散布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说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了，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但他不敢把西逃四川的打算公开端出来，而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大家，发誓不离开鄂予皖，伪称红军主力只是跳到包围圈外保存力量，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十月十五日深夜，红四方百军主力四个师二万多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当时，如果有正确的战略计划，打破“围剿”还是可能的。许多同志都认为在京汉路西活动一个时期就会转回根据地，那知因张国焘仓皇失措，一味西逃，丢下鄂予皖根据地不管，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张国焘西逃之后，后方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广大干部群众毫无准备。当掉队的伤员从陕西回来，才知道他已进入陕西。后来，中央通知鄂予皖省委，说张国焘已经拉着四方百军主力进入四川，不要指望他回鄂予皖了。蒋匪军乘机闯进根据地，疯狂烧杀，把大别山区浸沉在血泊之中，鄂予皖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但是，蒋匪军的疯狂“围剿”和张国焘的阴谋破坏，都未能达到他们彻底摧毁鄂予皖根据地和红四方百军的罪恶目的。英勇的红四方百军主力队伍粉碎了敌人的追击堵截，进入四川北边，创造了川陕根据地，大大发展了革命力量。留在鄂予皖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重造红二十五军，组织红二十八军，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大别山区的红色火炬，一直在熊熊燃烧。

（续 二）